

梁晓声精读系列

故人往事

梁晓声\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精读系列

故人往事

梁晓声\著

丛书策划\李世跃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人往事 / 梁晓声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039-5896-0

I. ①故…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9349号

故人往事

著 者 梁晓声

责任编辑 董 耘

装帧设计 顾 紫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896-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书·作者·编辑与出版社

梁晓声

我很高兴文化艺术出版社也为我出版这套小开本的书。

自然，同时希望读者喜欢。

依我想来，书与它的作者的关系，很像厨师与自己烹饪的菜肴的关系，不必道道非得是所谓奇馐珍味，但一定要确保那是健康食品。至于用什么样式的盘子端在方的或圆的桌上，交由编辑们去考虑可也。

依我想来，书与它的读者的关系，很像公园与游人的关系。某些人之所以常去某一公园，往往因为心性欲寻一处静好的环境，于是远离浮躁，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思索点儿什么平日无暇思索的事情。

好书是千般百种的，但有一类书永远在好书之例，便是能通过文字洗涤人心灵的书。

我认为当今之中国人，十之八九的心灵是需要以

好书来洗涤的，只不过许多人还没太明白自己很需要那样——于是反而以习惯于找乐子找刺激的眼来看待书，倘从书中看到了便大获满足，以为那才是好书。一个简单的问题乃是——在今天，您如果想找乐子找刺激，别处找去不是更能大获满足吗？

依我想来，作者与编辑与出版社的关系，如同花草树木与园丁与公园负责人的关系——作者本身是花草树木，将什么样的花草树木引入园中并将之栽培好以供游人欣赏是园丁的事，而公园负责人的使命在于使园中的植物种类多些，再多些，尽可能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归根结底，人类仍需要书，乃因书依然是有益于人心向好，社会向好的精神眷爱物。

故，为了有益于人心向好、社会向好、批判假丑恶的书的作者，内心里对真善美应具有比一般人更敏感、更诚挚的追求与奉献自觉。

而作者内心里有与没有是不难通过书来判断的。

好编辑有此眼光。

好的出版社负责人也必然有此判断水平。

目 录

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 1

伊人如凤 俊友如斯 \ 31

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 38

故人往事 \ 46

巴金的启示 \ 57

沉思鲁迅 \ 65

沉思闻一多 \ 80

未死的沙威 \ 87

教授之死 \ 97

老茶农和他的女儿 \ 128

看自行车的女人 \ 139

王妈妈印象 \ 147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 161

老 姬 \ 170

瘦老头 \ 173

怀念赵大爷 \ 194

朱师傅一家 \ 198

这个女人不寻常 \ 207

小垃圾女 \ 215

戴橘色套袖的人 \ 223

演员与看客 \ 230

/ 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

虽然，我已经60余岁了，但对于黄宗英，我还是得称前辈。因为她今年已经88岁，长我二十四五岁呢。事实上，“前辈”这一种称谓相当中国化。即使在我们中国，也相当的古代，还多少具有点儿江湖意味。在当下生活中，我们已不太听得到“前辈”这一称谓了，似乎只有在武侠片中还听得到。据说网上挺流行，也同样只不过出现在网络上的后武侠小说中。并且，网络本就是很江湖气的地方，十之七八的网主们的名字，不论男女，也都挺江湖气的。

我和黄宗英都是中国文坛上的人。以我的个人感觉而论，亦觉中国之文坛，往往也江湖气弥漫。倒不是由于文坛上一向的是是非非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实际上外国之文坛，比如西方吧，也每是风生水起、是非频发的，但却并不给我以江湖气浓的印象。为什么我们中国之文坛，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呢？大约是由于我们中国之文坛拉帮结派，形成团伙的风气较

盛的缘故吧？除了这一缘故，还有另外的因素吗？肯定是有。那又是些什么因素呢？我还没想清楚，此不赘述。

但我犹豫再三，决定在此文中及文内称黄宗英为前辈，并不意味着我对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称谓情有独钟，更不意味着我对中国文坛之江湖气很认同。恰恰相反，我讨厌任何所在的江湖气，也从未属于过任何或大或小的“圈子”。

我称黄宗英为前辈，只因一点，她年长于我不是几岁、十几岁，而是二十四五岁。如果她是男性，我当按中国习惯称她为“黄老”，或“宗英老”。但她是女性，并且我了解，她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那样一颗心即使某一天停止了跳动，前一分钟也必定还是年轻着的；所以我不愿在对她的称谓之中加入“老”字。事实上，此前不论当面或背后，我一向是称她“宗英老师”的。那么，在这一篇短文的题目中和文内，一如既往地称她为“宗英老师”，岂不是更亲近吗？那是的。但我内心里，对她始终是怀有很深厚的感恩情结的，而我写此文所要表达的，正是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竟变得越来越难以忘却的感恩情结。我怕亲切抵消了感恩。即使仅仅抵消了一部分，那也是违背我写此文之初衷的。我读某些具有感恩色彩的文章，包括

那些和我这篇文章的初衷一样的文章，每使我产生一种变味的印象，就是由于称呼似乎太亲近了，写到后来，感恩的元素少了，亲近的成分多了，结果感恩被亲近所稀释，仿佛便更是一篇记录友情的文章了。何况，尽管黄宗英前辈每次见到我，对我的态度无疑是亲近的，见面也无疑令她感到高兴，但若论到友情的话，其实我们之间反而并没什么值得书写的内容。

真的是这样。

前辈黄宗英，她是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我写此文之目的，也完全是为了以记录性文章的方式来公开表达我对她的感恩。

我在“文革”前就知道黄宗英的大名了。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当年在收音机里广播过。我家没有收音机，我是从中学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当时给我以特别满足的语言享受。是一位女朗读员朗读的，她的声音圆润而豁亮，仿佛唱着歌的泉水从山涧流淌而过，携带着悠扬的回声。以现在的美文标准来看，《小丫扛大旗》的文学并不能算极好。但在当年，女报告文学作家凤毛麟角，黄宗英又是演员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长期浸淫于电影界，置身于上影厂这一特殊的文艺单位，经常接触皆有丰富经验的导演、演员们；再加上她善于观察生活的一双慧眼，几乎可以

说天生地从生活中捕捉细节的能力；她自己坦率、快乐的性格，发自内心的以赞颂时代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为己任的使命感，等等因素，使她极善于将笔下人物写得“活起来”的同时，也极善于营造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生活气息。她写一篇报告文学如同导演在执导一部电影。她笔下的人物，不分主次，一概都能恰到好处地在她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凸显角色的作用和魅力。当年，中国的收音机里，最经常播出的是根据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评书。那些评书更偏重的是故事，对文字之感染力是不太在意的。

总而言之，《小丫扛大旗》使我这一名中学生第一次领略了生动活泼的文字被女性好听的声音所朗读的美感。

我便记住了“黄宗英”这个名字。

但是我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名知识青年，与《小丫扛大旗》这一篇赞颂中国最早的一批下乡知识青年的报告文学没一点儿关系。

后来我初中毕业了。

后来“文革”开始了。

在1967年的冬季，哈尔滨市的某电影院，连续几天放映“反动电影”，曰“批判观看”。是由哈市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们发起组织的放映，某几所重点中学

的“革命师生”也得到了一些票。我所在的第二十九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但那一年我与一名三中的高三男生成了朋友。三中是重点中学，他是“红五类”，由他给过我几次票，于是我得以看到了几部以前不曾看过的电影，包括赵丹主演的《十字街头》、《武训传》、《林则徐》、《李时珍》。

我至今认为赵丹主演的《林则徐》、《李时珍》，演技炉火纯青。这两部电影中，他主演的林则徐尤见功力。并且一直认为，以后不论再拍多少次《林则徐》，“赵丹化”的林则徐恐怕无人可以企及了。我也至今特别喜欢《十字街头》，觉得那一部电影中的赵丹，大演员的天赋已被他充分证明。那时的他，其实身上已兼具卓别林式的黑色又温暖的幽默和金·凯利式的即兴表演的机智。可我当年却并不喜欢《武训传》，至今也还是喜欢不起来。武训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办义学的极虔诚、极执着的愿望自然是无私的、可敬的、令人感动的。但他所实行的向富人“集资”和募捐的方式，就是不惜以自身为“靶”供人羞辱，“打一拳三个钱，踢一脚五个钱”的方式，对于受西方文学影响特深、人格尊严意识特强的我，是实难认同的。

那一年我已知道黄宗英是赵丹的夫人。

三中的朋友问我愿不愿写一篇批判赵丹主演的电

影的文章，写了就能收在几所大学的联合主办的大批判文集中。但我印象中的赵丹，用《列宁在十月》中高尔基对列宁说的话来说，是“一个好人”。这是我对赵丹所演角色的印象。

我反问：你怎么不写？

他说：我是理科生啊，不感兴趣。

我说：那么优秀的几部电影，有什么可批判的呢？

他也反问：你不是不怎么喜欢《武训传》吗？

我说：一个人不喜欢的文艺作品，评论是一种权利。但动辄乱扣“反动”大帽子地进行批判，并且剥夺被批判者的辩论权利，这样的批判不就等于是迫害吗？

他说：你又何必太认真呢。多你一个人的批判文章，少你一个人的批判文章，其实对于赵丹的命运都没什么影响了。但是对我们俩却有一点好处，我们就有资格再多看几部电影了，许多电影我们以后也许永远都看不到了！

他的话很代表了当年之中国一些确实挺好的人的想法——多我一个人参与少我一个人参与，多我一句口号少我一句口号，多我一张大字报少我一张大字报，反正对已被划入“另册”的人的命运不起任何作用了，于是对自己的参与首先自行地宽恕了。倘还有一点个人好处，则更是“盲从无罪”了。在“文革”初

期，我也是这么想的。不久，我所读过的那些书便提醒我——好人被利用了参与迫害别人，即不但是被迫害者的大悲哀，同时也是好人们的大悲哀。

故我对我的好人朋友说：你我互为朋友，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对方是好人，对吧？那就让我们把好人做得再好一点点，而别在乎以后看不到某些电影了吧！……

一年后，我下乡了。

黄宗英也罢，赵丹也罢，在我的头脑中，渐渐地不留任何记忆痕迹了。

大约是1973年，我到佳木斯去参加兵团总司令部文艺处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听说黄宗英由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并在哈尔滨观看“全省青年诗歌朗诵会”。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几名知青，发起了对学习班组织者的建议——将黄宗英请到佳木斯来，与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知青们交流交流创作体会和经验。这自然也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我对那建议表现得格外支持。学习班的组织者崔长勇是我们共同的“好大哥”，我们的建议正中他下怀。但那也得向上级请示啊！政治部的批复很快，大意是——黄宗英既然是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的，但请无妨。“好大哥”特高兴，欲亲自到哈尔滨去请黄宗英。却随之传

来了令我们震惊的情况——她被省革委会的干部从哈尔滨驱逐走了，并且还被扣上了一项新的罪名——企图靠昔日名气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文艺青年，实行反革命串联……

革命热情澎湃洋溢的《小丫扛大旗》的作者，头脑中会有什么“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呢？

我们不禁地都愤愤不平起来。

“好大哥”居然信誓旦旦地表示——早晚有一天，会想办法将赵桔调到兵团来，并且要尽早满足其入团愿望。但他这种决定直至“文革”结束也没实现，而赵桔在东北下乡九年也终究还是没入得了团。此是后话。

以上听来的情况，促使我做出过一件既郑重又特不“明智”的事。

1974年我入复旦大学前两天，仍在木材加工厂做出料工，那是比抬木头更累的活儿。我可以不干活儿了，录取通知书已发给我了，按规定我享有几天准备行程的时间。我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一心想用坚持劳动到最后一天来抵消一些别的知青对我的羡慕。两天后就将离开北大荒了，我决定为某些知青作最后一次代言。于是前两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食堂里，给连队团支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将信转送团里。那是一封谈我对发展知青入团入党的组织

路线之意见的信。我的信指出——在有些人的头脑中，“重在表现”四个字，几乎不起作用，他们对于那些家庭出身“有问题”或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知青，其实实行的是发展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还举了赵桔的例子，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难道用多年的艰苦劳动和青春岁月，还换不来一枚团徽吗？”而实际上，所谓“关门主义”并不表现在我们木材加工厂，因为在木材加工厂，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的，恰恰便是两名家庭出身属于“剥削阶级”的天津知识青年。在我曾经当过班长和小学教师的老连队，实行的也是“重在表现”。进言之，在能入团或不能入团这件事上，赵桔的例子具有较多特殊性。我明知此点而举她这名并不属于兵团的知青为例，委实是有些蛇口蜂针的。我的动念，确乎也主要是为她那样的知青们一鸣不平而已。（三十几年后，木材厂的两名天津知青非将我请到天津去做客不可。我去了，他俩在招待我的饭桌上对我说：你幸亏走得及时，晚一天你就去不成复旦了。当年我们觉得你那封信的思想老反动了。你虽然走了，我们还是将信的反动思想批判了一通，并且要求团里严肃处理。你居然顺利地成为复旦的学生，证明当年团里有人暗保了你一下啊！我于是明白，他俩非把我请到天津不可，是要当面道歉。而

我却早已将那事忘了。我在木材厂时与他二人关系良好，我的信肯定使他俩当年大为其难了，他们除了那么做显然也没有另外更“正确”的做法，于是互相举杯一撞，皆释怀而笑。再后来我在创作电视剧《知青》时，自己当年写的那一封信，成了剧本中的情节。）

我在复旦的三年，自然是思想孤独而苦闷的三年。那三年里，所知“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之事更多，反而又将黄宗英、赵丹、赵桔这一家三口人的名字忘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结束了。

1977年5月，上海以极大的动作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如今想来，那般隆重地予以纪念，用心可谓良苦。那应该说是一次被打入“另册”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集体大亮相。也许是由于应该参加的人数太多，复旦大学仅获得一个名额。名额自然给在了中文系，而中文系居然将名额给在了我这名7月份就将毕业的学生头上。由此可见，当年大学母校的老师们是多么地厚爱我！

纪念会共开三天，我所分在的一个组，组长是茹志鹃老师（当年我才30余岁，自然称她老师。现在我60余岁了，她已驾鹤西去，那么我就同样在此文中称她先辈吧。她也是有恩于我的人。此不赘述，当另记